

论罗兰·巴特文化与意识形态批判

——从“神话学”到符号学的转换

龙佳解 陈 磊

[提要]现代意识形态往往自诩为是合乎事物自然本性的言说,因而可以讽之为“神话”。“神话学”方法运用讥讽旨在揭露近现代文学创作在价值中立立场掩盖下的去历史性。符号学方法则揭示出文学或文化的生产借助于语言符号系统的意指活动将其包含的文化与意识形态意义自然化。从“神话学”方法向符号学方法的转换表现出罗兰·巴特的包含历史主义的结构主义转向。

[关键词]罗兰·巴特;讥讽;含蓄意指记号系统;文化批判

中图分类号: I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3926(2017)10—0166—07

基金项目: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课题“马克思的文化批判理论研究”(11YBA054)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龙佳解,男,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陈磊,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西南民族大学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助理研究员。湖南长沙 410000

罗兰·巴特早期从事的研究主要是对法国近现代文学创作中自诩为价值中立的立场的揭露批判,他将这种立场讥讽为“社会神话”,并且自认为是受马克思等左翼思想家的影响^{[1] [P.124]}。巴特认为,由于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各种矛盾的时代之中,讥讽可以成为我们表达真理的方式。^{[2] [P.30]}他的这些研究确立了一种后来对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卓有影响的“神话学”(Mythologies)方法。后来在以索绪尔为代表的语言结构学派的影响下,巴特从分析文化符号的内在结构入手,研究文化符号隐喻意识形态并将其“自然化”的方式。由此,罗兰·巴特发展出一种历史主义和构成主义相结合的独特的文化与意识形态批判方法。

一、文学写作中保持价值中立的神话

巴特认为文学写作不能仅仅看作完全是个人的一种活动,或者表达作者个人的某种心理体验,或者采取的某种个别写作形式,譬如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等,而是一种将某种个人写作语言之外的事物加诸于读者的活动,这种语言之外的某种事物既表现为历史又表现为历史对文学写作人们的制约。因此,应该从文学记号的表层形式的历史探索它与深层社会结构的历史的联系。历史上

的社会结构在文学写作中实际上以一种“形式性的现实”存在,它独立于语言和风格。^{[3] [P.3-5]}这可以从法国古典主义写作和现代主义写作的流变来加以说明。

法国古典写作主义是指1650年到1850年期间的各种不同文学风格的写作,主要指莫里哀、司汤达和巴尔扎克等作家的写作。在1650年之前,法国的文学写作主要描绘自然,而在此之后,法国文学写作则热衷于对人性的揭示。^{[3] [P.29]}法国古典主义写作以表达自然、合理而自夸,它不同于此前的文学语言在描绘自然时具有相当自由的美学想象而缺乏准确性,从而将自身确立为文学写作必须遵循的一种普遍范式。到了19世纪初,法国古典主义写作已被公认为是一种合乎自然的创作风格,是完全适合于准确地反映现实的唯一合理的文学写作方式。

但是巴特认为,法国古典主义写作形式并不是一种普遍的客观的价值中立的写作形式,相反,“古典写作显然是一种阶级的写作”^{[3] [P.30]}。它产生于17世纪资产阶级争取自身权利反对封建阶级的斗争中。它借助于资产阶级处于上升地位可以将自己的意识形态宣布为社会普遍意识的独断

论而形成,并迅速地清除了民众言语中自发形成的一切语法程序。它的语言的“明晰性是一种纯修辞学的性质,它并不是适用于一切时代和所有地方的一种语言的通性,而只是某种话语的理想的附属物,这种话语受到一种永久性的说服意图之支配”^{[3] P.31)}。因此,法国古典主义写作实质上不是一种自然的、中立的、能够明晰地准确再现现实的写作形式。它之所以当时被公认为是唯一合理的写作方式,是因为在其背后支配它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已被当时社会所普遍接受,同时法国古典主义作家们又追求修辞学上的语言表达的明晰性。法国古典主义写作在当时被视为是一种普遍的唯一合理的写作形式,而在今天看来这种说法只是一种社会神话,因为它的准确描绘事物的语言修辞学服务于当时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力图支配人们的说服意图。到了19世纪50年代,当这种准确描绘事物的修辞学特点不再适合表达文学作者们的思想与情感之时,古典主义写作就分崩离析了。曾经被认为是普遍的、客观的、准确的写作范式的神话破灭了,它被各种现代写作方式所取代。

从表面上看,古典主义写作的危机是它的写作修辞学的危机,是写作追求自然、明晰的语言表达而导致。而巴特认为古典主义写作的危机实质是由于法国社会阶级结构的深刻变化:在1850年前后,三件重要的新历史事实相汇聚:冶金工业取代纺织业,标志着现代资本主义的诞生;工人队伍壮大,城市人口开始超过农村人口的人口反转;法国社会变成了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三个敌对阶级鼎立的社会。^{[3] P.32)}这在历史上表现为1848年2月法国爆发的革命诞生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在当时成立的临时政府中有了工人推举的代表。由此,法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一统天下的普遍性不复存在,法国社会三个阶级的意识形态相互角逐。因此,伴随着法国资产阶级的诞生而诞生的古典主义写作形式,曾经被视作为是一种自然准确反映现实的写作范式,现在也受到了某些文学作者们的质疑。

1850年以后,法国文学中出现了一种号称为“零度写作”或“白色写作”的新的写作形式。它认为文学写作不应该持某种价值立场,主张文学作品中对社会现实的价值评判应该为“零”的纯文

学。“零度写作”在语言修辞学上表现为一种直陈式写作,或者说一种新闻式写作。它自认为是一种不附带任何价值观的中性的新写作。巴特讥讽到,这种文学写作当时只能生存于社会各阶级价值观的呼声和评判日益喧嚣的客观环境里而自己却不想介入其中;而且自认为它的文学写作可以由社会价值观环境的“不在场”所构成。^{[3] P.39)}“零度写作”自夸为是一种“新闻式的”、“纯洁的”、对社会各阶级的争斗“毫不动心的”写作,它声称不“介入”当时社会的某种价值立场,亦即不对社会现实发表自己的价值评论和判断,没有任何说服人们接受某种价值立场的企图,使用的是一种没有隐喻暗示的透明的语言。它首先由法国作家加缪在其《局外人》的文学写作中加以运用,而罗伯-格里耶的“新小说”则可以视作为这种写作的典型代表。与过去传统的各种文学形式迥异,“新小说”宣称既不再以人类中心论的态度去看待自然界的客观事物,也不再给现实世界涂抹上各种情感的、社会学的、伦理学的以及形而上学的意义与价值,而是力图使现实世界摆脱人的价值立场的影响,使其以价值中立的面貌呈现出来,即“设法建立一个更坚实、更直接的世界,以取代那个‘意义的’(包括心理的、社会的、功能意义的)世界”^{[4] P.254)}。在格里耶看来,社会政治生活不断地迫使我们设想某些公认的历史的或者道德的意义。然而这些历史的或者道德的意义终究不过是某种价值偏见,它们作为现成的东西已经变得僵化、凝固。“新小说”不再相信它们,也拒绝提供任何新的历史或道德的意义,而只是提供对于现实世界的“表层”描绘。^{[4] P.264)}由此可见,作为“零度写作”形式的“新小说”自认为是一种可以客观地再现现实世界,不赋予自己的文学写作任何历史的、道德的意义甚至是形而上学阐释的写作活动。它可以以情感上的“不介入”甚至是古希腊斯多亚派哲学的“不动心”态度来摆脱社会各种价值立场的控制。

尽管格里耶的“新小说”被评论为“零度写作”的典范,但巴特认为,没有什么比一种号称为“白色写作”或者“零度写作”的文学写作更不真实的了。^{[3] P.40)}“零度写作”希望独立于法国社会各阶级意识形态价值观斗争之外,逃脱某种意识形态价值观的支配,实质上它正在创造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即以“对一种绝对齐一性的社会

状态的期待”来抵制社会各阶级分裂的现实。这本身就是一种社会乌托邦并且力图将其投射到文学写作上。^{[3] (P.44)}因此,巴特认为“零度写作”作为一种法国现代文学写作如同整个现代艺术一样是一种携带着双重梦想的运动:与现实断裂的运动和新期待降临的运动。这表明它憎恶现实社会试图与它相断裂,希冀一种新的社会乌托邦的诞生。因此它既具有现实历史的异化感又具有历史新期待的梦想。作为一种文学写作发展的必然性,它证明了文学写作语言的分裂,这种分裂又是与社会各阶级的分裂联系在一起。它认为作为作家具有的自身的写作自由,它就是这种追求自身自由克服社会分裂和超越社会分裂的努力。^{[3] (P.45)}

但是巴特认为,对于文学写作来说,社会价值观的制约是一种无法逃脱的牢笼,一切文学写作都是受某种社会价值观制约的。那些自认为可以创造出一种摆脱社会历史价值观制约、具有超越社会历史价值观的普遍性的文学写作都是一个有关文学写作的意识形态神话。只是文学写作与社会历史价值观的联系不能用历史直接决定论的观点来加以理解,从而否认作家选择文学写作的社会历史对象的自由和个人创作风格的自由。^{[3] (P.4)}

二、语言结构是文学写作历史性的中介

巴特认为历史对文学写作的制约也可以通过文学写作的语言结构表现出来。“语言结构是某一时代一切作家共同遵从的一套规定和习惯”^{[3] (P.6)},而历史渗透于语言结构。^{[3] (P.7)}对于作家来说,历史像是规定了在若干种语言伦理中你所面临的选择。^{[3] (P.10)}索绪尔受埃米尔·涂尔干的影响,将语言结构视作一种社会事实而不是个人的行为。巴特接受了索绪尔的这种观点,也把语言结构视作一种社会性的制度系统。^{[5] (P.4)}

在叙事体小说的写作中,简单过去时是一个常用的句式。巴特认为简单过去时句式动词的使用和第三人称的用法,都存在赋予叙事以秩序的功能。^{[3] (P.17-19)}在简单过去时句式中,动词暗中构成了叙事的因果链,它建构了一个互相联系的朝向某种方向的行为组合,并且将时间性和因果性相联系从而引进了过程的观点,使叙事变得可理解。因而,简单过去时句式成为了构造世界的理想工具。它所使用的第三人称手法,使得在它背后永远隐藏着一个作为造物主的叙事者。这个叙事者在每一个句子中将人物的行为联系起来并

且赋予等级关系,也就拒绝了组成故事中各存在物原有的不可穿透性和孤立性。同时,简单过去时句式又能够快速地把一种原因和一种目的结合起来,它使故事中的人的活动具有了意义,摆脱了故事中人物生存的不稳定性,获得了一种如同代数式的稳定性和人的生存图式。因此,简单过去时句式最终就是一种秩序的表现,人们在阅读简单过去时句式同时获得这种秩序时也就产生一种欣快感。

其后在其符号学中,巴特认为服装语言结构、饮食语言结构和家具语言结构等都存在两种基本关系: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前者为横向的,后者为纵向的。它们都内蕴了日常社会生活中的规则。^{[5] (P.15-17)}如组成饮食语言结构的成分是:1. 饮食禁忌表现了排除规则。2. 有待确定的菜肴诸单元间的意指性对立,如甜与咸的对立,表现了搭配规则等。3. 同时性(指可以同时上的菜)或相续性(指一套菜的先后上菜顺序)所表现的联合规则。4. 用餐礼仪语言更是表现了大家熟悉的诸多社会规则。

因此,巴特认为语言结构中词汇之间的横向组合关系和纵向聚合关系实质上反映了某一时代的各种社会性规则和习惯。语言结构中的这些词汇的选择及其之间的联合关系的合理性对文学写作的制约实质上是各种成文和不成文的社会制度的制约。正如英国学者多米尼克·斯特里纳蒂在对巴特这种观点进行解读时说,虽然世界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客观世界的可理解性要依赖于已经赋予其意义的各种符码或者各种社会语言符号系统。这些符码和语言符号系统并不是普遍地既定的,而是根据存在于它们背后的特定利益和目的历史地社会地制定出来的。正是由此,世界绝不是单纯的。世界的意义不是某种既定的,也不是可以被认为理当如此。它是根据历史地变化着的各种符码和语言符号系统制造出来的。^{[6] (P.123)}从这个角度而言,所谓文学写作和其他写作认知和去把握现实世界就是运用各种符号系统去生产现实世界的各种意义,这些符号系统如何建构其背后牵涉到某种社会权力和利益关系,因而文学写作对现实世界认知和把握也不可避免地受某种与特定社会权力和利益关系相关联的价值观的支配。

巴特把语言结构对文学写作的制约性比喻为

人类认知的一条“地平线”。^{[3] (P.7)} 地平线把被禁止者和被允许者分开。地平线以上部分是人类所能认识的和允许认识的,而地平线以下则是人类所不能认识和禁止去认识的,从而地平线给人类的认识划分了一条界限。人们不询问这种划分的根源或理由是什么,因为这已经成为一种“自然”。这就是说语言结构对作家来说像是一条地平线,它给作家的文学写作划定了一条界限,因而它的性质是否定性的。^{[3] (P.6-7)} 但是语言结构又是人类的“未分财产”而非为作家个人所私有。对于作家来说,它是其行为的场所,也是一种实现其写作的可能性的确定性和期待。作家选择某种言语进行写作不需要事先作出某种社会性承诺,而是一种无条件的反射。语言结构存在于作家个人的文学习惯之外,它是按照其语言结构本性而非由于作家个人选择而成为文学写作的社会性对象的。^{[3] (P.6)} 由此可知,语言结构作为作家的行为场所和地平线,既给作家的写作提供了写作的平台,但是这种写作平台又是对作家进行自由写作的限制。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囚禁作家写作活动的无法逃逸的囚笼。

从认识论的角度看,人类运用语言去把握事物,离不开对事物进行归纳分类,归纳分类则赋予了事物以秩序。“秩序既意味着分配又意味着威胁。”^{[3] (P.147)} 因而所有的归纳分类都是压制性的,因为它是归纳分类者对被归纳分类者的一种胁迫,要求它服从归纳分类者所喜爱的秩序。英国学者马克·J·史密斯说道:“当我们描述、归类我们所观察之物时,文化价值一直在发挥作用;当我们对事物分类时,我们也在对它们下判断。在我们为事物命名时,我们也在以一种等级秩序和道德价值的评估来赋予它们一个名分和位置。通过我们所使用的同样的词语,我们赋予所谈论的事物以价值。”^{[7] (P.63)} 由此可见,人类语言对人类用语言所把握的事物具有强暴作用。正如巴特援引雅各布森指出的,一个习语与其说是按照它允许去说的来定义,不如说是按照它迫使人说的来定义。^{[3] (P.147)} 因此,语言结构是一种法规,其中存在着权势。人们说话,严格地说是如同福柯所讲的发出话语,它并非是人们通常强调的是在沟通,而是在使人服从。“全部语言结构是一种被普遍化了的支配力量。”^{[3] (P.148)} 它包含着一种不可避免的支配关系。

经过进一步的分析,巴特发现语言结构除了自身具有支配力量外它也为某种社会历史权势服务。因为语言结构中必然存在两种现象:权威性断言和群体性重复。从前者,语言的直接断言包含着肯定或否定、怀疑或可能以及终止等特殊机制,并且往往通过语言加以伪装。譬如,人们经常使用“请”的情态词就表明人们企图弱化语言结构的不可改变的确认力量。从后者,构成语言结构的记号具有追随者、合群者。语言记号不断被群体确认和重复使用而形成固定型式。因此,每当人说话使用言语时,这两种现象都存在,于是人在使用言语说话时,他既是主人又是奴仆。^{[3] (P.148)} 因为他既作出了某种断言,又是一位合群者。

但是巴特认为,语言结构作为文学写作的一种支配力量并没有消解作家的写作自由。因为语言结构在文学的历史制约性之内,而作家的个人写作风格则在文学的历史制约性之外。^{[3] (P.7)} 虽然作家不可能自由地选择不透明的语言结构,因为穿透语言结构的乃是整部历史,它的完整性和统一性如同自然。然而“风格的所指物存在于一种生物学的或一种个人经历的水平上,而不是存在于历史的水平上”。^{[3] (P.7)} 它表现作家个人的孤独自我,属于文学习性的私人成分,虽然产生于作家个人隐秘的内心深处,却延伸到他的自觉控制之外。所以,作家的个人写作风格如其形象思维、叙事方式习性和独具个性的词汇等都是从作家的个人身体和经历中形成的,并逐渐成为个人的也是整个文学艺术创作规律的组成部分。因此,作家的写作风格同社会无涉,却向社会显现。^{[3] (P.7)} 由于追求这种风格而发展出作家自足性的个性语言,它构成作家个人语言结构与事物的最初的对偶关系。

严格意义上,作家个人的风格是不可认识的,人们无法弄清它产生的缘由,因而它存在于文学研究之外。因为它作为作家个人的一个未知的而又隐秘的本能的装饰性声音,是一种发生学现象,是作家个人性情的盲目的和固执的蜕变之结果。巴特把作家个人写作风格比喻为作家思想的“垂直和单一的维面”,即反映的是作家个人的独特的纵向的生活经历。

因此,巴特认为“语言结构的水平性与风格的垂直性共同构成了作家的一种天性”。在贯穿整部历史的语言结构中作家发现了历史的熟悉性,

而在作家个人的创作风格中则发现了本人经历的熟悉性。^{[3] (P.8)} 因此,语言结构与个人风格在作家眼中都是某种盲目的力量,而作家的文学写作则是一种历史性地协调这两种力量的行为。由此,巴特认为文学既是绝对现实主义的,因为只有现实才是文学欲望的对象;同时文学又固执地要求自己是非现实主义的,因为它认为文学对不可能之事物的欲望是合理的。^{[3] (P.152)}

三、含蓄意指记号系统将历史转变为自然

巴特认为神话作为一种言说方式,它的真正目的是“把历史转变成自然。”各种现代意识形态可以讥讽为“神话”,是因为它们都将自己所持的社会和文化方面的特殊性立场转变为普遍性立场、将自己的历史性转变为合乎自然,从而获得合理性和永恒性,来掩盖自身的特殊性立场不可避免带来的片面性和历史性所意味的可改变性。神话作为一种言说方式也是“一种意指形式”。这种意指形式的特点是合乎自然,它能够把社会和文化之物转变为合乎自然之物。

神话的意指形式生产过程都需要“符码”的存在,因此巴特选择了运用语言学对记号进行研究的方法,分析一切符号学事实和意指现象。

在索绪尔那里,作为语言学的记号都是由能指和所指而组成。能指构成语言的表达面,所指构成语言的内容面,它们两者结合构成一个语言意指系统。巴特认为,符号学的记号与语言学的记号类似,也是由能指和所指构成,但是它们的内质却可以各有不同。这表现在,符号学系统出现了两类记号:一类是不人为主观介入意指作用的表达自然内质的记号,如衣服是用来御寒的,食物是用来充饥的,它们的意指是自然产生的,没有人人为的意图;另一类是人有意介入意指、具有某种人为意指目的的记号,如衣服意指御寒以外的功能如人的社会地位等级高低等。前一类记号表达的是事物的自然功能;后一类记号表达的是特定社会赋予的社会功能。^{[5] (P.27-28)} 前一类记号是语言记号,它的社会约定已被自然化。正如列维-斯特劳斯所解释,这类语言记号是先验任意性和后验非任意性的统一。所谓先验任意性是指每一语言记号中的能指与所指在实践之初的结合完全是偶然的任意的,即巴特所认为它是无理据性的。所谓后验非任意性是指每一语言记号中的能指与所指虽然在实践之初完全是偶然的任意的结合所

形成的社会约定,但是在其后历史的长河中已被自然化成为非任意性的规则性的东西。所以巴特认为这一类记号是用不着追问其理据的,可以说是无理据性的。后一类记号的意指由于是特定社会赋予的因而是任意性的和理据性的,在这里实现能指和所指的结合以及结合是否完善,完全取决于特定社会中创造此类记号系统的意指活动的主观目的性和修辞学的说服能力。^{[5] (P.36)} 人们可以追问此类记号的理据性。符号学的这两类记号系统,巴特又取名为第一级记号系统和第二级记号系统。

从符号学系统形成的两类记号必然导致符号学的意指系统可以分为两类:直接意指记号系统和含蓄意指记号系统。第一级记号系统称之为直接意指记号系统。第二级记号系统称之为含蓄意指记号系统,又可称之为意识形态的符号学记号系统。含蓄意指记号系统记号的能指由直接意指记号系统所构成,包括了直接意指记号系统的能指和所指,它的所指指向社会的某种文化意义或意识形态。

巴特说“涵指的能指被称作涵指项,它是由被直指的系统的诸记号(被结合的能指与所指)所构成的。至于涵指的所指,它的性质既是一般的、完整的,又是分散的。或许可以说,它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这些所指同文化、知识、历史密切相通,可以说正是因此之故,外在世界才渗入记号系统。”^{[5] (P.70)}

具体而言,表达某种社会文化意义或意识形态的记号意指系统是第二级记号系统,即含蓄意指记号系统。但是这些特定的社会文化意义或意识形态之所以能够被视之为自然和能够被人所接受,乃是由于表达它们的含蓄意指记号系统记号的“能指”已经由直接意指记号系统的记号形成。如上所指出的,直接意指记号系统的记号是语言学记号,它的意指先验约定,不需要理据,是自然的,已得到集体认同。因此,含蓄意指记号系统的记号既是自然的,又是历史的。“自然的”是指它的能指是由直接意指记号系统记号所构成,“历史的”指它的所指是特定的社会文化意义或意识形态。当它们两者共同构成同一个指涉关系时,借助于已经被得到集体认同的能指,从而使所指得到认同。

这可以解读为,直接意指记号系统记号构成

了含蓄意指记号系统记号的隐喻。也就是说直接意指记号系统记号指涉关系的确定内容或意义隐含了含蓄意指记号系统记号的指涉关系中所指负载的某种社会文化意义或意识形态意义。当人们接受了直接意指记号系统记号确定的指涉关系所表达的不证自明的内容或意义时,也就无意中接受了它的隐含之意。实际上这种隐喻是不透明的,不能让人一眼就能看穿的,它需要解读而且需要持某种特定立场才能解读出来。

巴特运用上述方法对一本法国杂志《巴黎竞赛》封面上一位法国军队的黑人士兵向法国国旗敬礼的照片进行了解读。这张照片可视之为一个符号系统。这个符号系统中的直接意指记号系统记号的简单指称意义是:一个黑人士兵正向法国国旗敬礼。这个画面的这种意义作为一个语言学的记号,不难获得集体认同,是十分自然的。但是巴特认为,对这张照片的解读不能停留于此,它还有更深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意义,这可以通过解读这张照片的含蓄意指记号系统的记号的指涉关系来得到。在这张照片的含蓄意指记号系统记号指涉关系中,它的所指关联到:法国是一个伟大的帝国,她对其所辖的所有国家的人民没有任何种族歧视,因此他们包括非洲裔国民都忠实地为她服务。甚至可以进一步解读出法国历史上的殖民主义不仅不能受到批判,反而是值得肯定甚至称颂的。

因此,作为直接意指记号系统的记号的指涉关系所表达的确定内涵:一个黑人士兵正向法国国旗敬礼。在巴特看来,它可以隐喻:肯定和称颂法国历史上的殖民主义。这种隐喻追溯到语言结构上,巴特建构了含蓄意指记号系统作为相对应的承载者。由此,巴特不仅揭示出一般语言学记号系统记号背后的意识形态内涵,揭露出暗藏的社会权力和利益关系对语言结构的支配,而且通过建构含蓄意指记号系统发展了索绪尔的语言结构理论。

巴特认为,含蓄意指记号系统的能指作为一种隐喻是一个能指集合的领域,有各种能指可供选择,因而它是种修辞学。因此,对含蓄意指记号系统的能指方面的有效性和说服力进行研究,或者说如何讲好一个“故事”就成为修辞学的任务。现代修辞学的发达则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向社会各个领域的无形渗透提供了有益的帮助。

四、历史主义和构成主义的结合

索绪尔认为“现实不是被语言反映出来,而是由语言生产出来。”^{[8] [P.105]} 语言有着固定的内在差异结构,混沌的人类意识和外部世界是由人类语言符号内部的差异结构赋予规则和秩序从而具有了可理解性。这就是说,现实事物的可理解性并不来自于其事物本身的性质,而是由语言系统内部的差异结构所产生的。巴特的“符号学”继承了索绪尔“构成主义”的意义理论,在现实与语言的关系上,也坚持语言建构现实而不是反映现实。然而,在语言与现实的关系上,过去流行的观点是坚持语言是思维的外壳,语言仅仅能反映现实而不能塑造现实,语言被视作工具。索绪尔和巴特都反对此种观点,认为它陷入了语言工具论和现实决定论的客体主义。但是索绪尔的语言结构主义对于语言生产现实机理的分析,注重于语言结构的共时性、形式的和抽象的维度,语言建构出的现实缺乏社会与历史维度,它忽略了特定历史时期、特定社会关系中的权力关系和利益关系在语言建构现实上的重要作用,也无法知晓每一历史时代物质世界的文化意义与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系统可以借由语言符号系统来建构。

巴特的“符号学”通过引入含蓄意指记号系统把社会历史纳入到语言结构的意指结构之内,使作为语言结构的外部语境的社会历史进入了语言结构内部,从而克服了索绪尔语言结构主义的封闭性和抽象性。因此巴特的“符号学”贯彻了一种语言结构的历史主义,即作为一般语言学记号系统的记号都隐含着某种特定的社会文化意义和意识形态内涵。因此,我们可以联系我们所处社会的权力关系和利益关系对各种语言符号结构进行解读,从而揭示出隐藏于自然约定形成的语言符号所表达的确定的自明的意义背后别样的社会文化意义和意识形态内涵,它们透现出社会权力和利益关系对我们的无形支配。

因此,一般语言学记号系统记号指涉关系中的事物并没有固定的本真的意义,受特定社会结构、权力结构支配的各种文化符号可以生产出事物更多的社会意义,这些社会意义我们不可以视之为来自这些事物本身。巴特说“我们可以想象十分古老的神话,但不存在永恒的神话;因为正是人类历史把现实转变为言语,而且是历史本身制约着神话语言的存亡。不管神话是否是古代的,

它只能有一个历史基础,因为神话是一种由历史选定的言语。它不可能从‘事物本性’中逐渐产生。”^{[9](P.219)}可以说,神话作为一种言说方式,产生于特定的历史语言,特定的历史语言为特定的社会结构和权力结构所制约。因而神话不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都有着特定的历史基础,它不可能来自所谓的事物的自然本性。因此,现代各种意识形态自诩为合乎自然而具有永恒的合理性,可以讥讽为一种神话。

因此,在“符号学”中巴特继续贯彻了神话学中分析文学写作的历史主义视野,同时又从语言结构主义的视野出发,探索社会历史在语言结构中的对应物。巴特的历史主义视野,表现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分析方法对其的影响;而他的语言结构主义视野,则探索语言结构如何充当了社会历史影响人们的中介,因而他反对历史直接决定论。因此,从神话学到符号学,巴特秉持着一种语言意义的历史主义和构成主义的结合。当然,这种结合是否完美,人们是否都是依照巴特所认为的解读方式去解读语言记号系统中所包含的意识形态内容并加以认同都是值得讨论的。巴特本人后来发展出来的“读者性”理论也在某种意义上反驳了这种观点。此外,索绪尔和巴特主张语言塑造现实和建构现实的构成主义观点是否会走向另一个极端,陷入了语言本体主义,也是可以加以讨论的。现在有许多学者认为,在语言与现实的关系上应该探索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巴特的研究应该说给我们提供了

某种启发。

巴特将结构主义符号学与文化和意识形态批判巧妙地结合起来,发现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被语言记号系统自然化的秘密。这种批判已经不停留于对社会文化背后的意识形态偏见的简单揭露,而是揭示人类的语言符号生产如何同意识形态生产相关联,从而开辟了意识形态批判的新思路。

参考文献:

- [1][法]罗兰·巴特. 罗兰·巴特自述[M]. 怀宇译.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
- [2][法]罗兰·巴特. 神话修辞术——批评与真实[M]. 屠友祥,温晋仪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 [3][法]罗兰·巴尔特. 写作的零度[M]. 李幼蒸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 [4]伍蠡甫,胡经之. 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C].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 [5][法]罗兰·巴尔特. 罗兰·巴尔特文集——符号学原理[M]. 李幼蒸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 [6][英]多米尼克·斯特里纳蒂. 通俗文化理论导论[M]. 阎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 [7][英]马克·J. 史密斯. 文化一再造社会科学[M]. 张美川译.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
- [8][英]特里·伊格尔顿. 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 王逢振译.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 [9][法]罗兰·巴尔特. 符号学原理——结构主义文学理论文选[M]. 李幼蒸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

收稿日期 2017-08-20 责任编辑 申燕